

# 戴雨農其人其事(一)

費雲文

## 前 言

戴雨農先生是我國近代歷史上的特別人物，其事功的宏偉，志業的恢廓，德澤的綿長和英風的廣被，有非常人所能及者。但以事多隱秘，牽涉較大；過去之所以未便公諸於世的，轉為中外人士所揣測；對於其人其事，或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

與戴先生相處三年的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國海軍中將梅樂斯(Multon F. Miles)，曾經在他的遺書「另一種戰爭」(A different Kind of War)中慨乎言之的說：「戴雨農和那些密切的工作人員，是我在中國所看到的最有事實表現的正當人，但却反而被人基於一種正當法庭所決不接受的偽證，施以廣泛的譴責」。

戴先生于民國卅五年殉職，現在時勢不同，許多事實，保密的因素已不存在了。我覺得應當把戴先生的精神志業，和一些曾經關係國家安危和戰爭勝敗的重要史蹟，公諸大眾。一方面振芳揚烈，對那些為多難的國家犧牲奮鬥的無名英

雄，致崇高的敬意，同時也讓大家瞭解當年的事實真相，以便對正在為反攻復國努力奮鬥的後繼志士，發精神鼓舞的作用。因此，近兩年以來，筆者曾應「中外雜誌」之請，就我所知的事實，平實懇切的，先後發表「戴雨農與中美合作所」、「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戴雨農與抗日殺奸團」、「戴雨農與雷鳴遠」、「戴雨農與現代警察」、「戴雨農與鄭介民」六篇文章。雖然長篇累牘，仍未能全其概要。

今年三月十七日，適值戴先生殉職卅週年，感觸時艱，思慕益深；且以「中外雜誌」負責人一再催稿，因再就其家世為人，和一些前所未述的重大事蹟，簡明扼要的集纂成文，作為補充，以饜讀者，並繼前志。

## 英姿挺異母教賢明

戴雨農先生是浙江江山人，名笠，譜名春風，學名徵蘭；民前十五年(一八九七)農曆四月廿七日酉時，生於江郎山與仙霞嶺之間的保安村，山清水秀，風景優美。宋朝名臣歐陽修曾有詩

句云：「陽生羣木秀，寒入亂峯青；吾子東南美，人賢蓋地靈」，可以為戴先生寫照了。

戴先生的祖父順旺公，務農，小有田財，克己行善；父親冠英公，當戴先生幼年，即因病逝世。因此，戴先生是在他母親藍太夫人撫育之下長成的。

藍太夫人是名儒之女，明大義，識大體，是非常賢德的良母。撐持戴家門戶，孤兒寡婦，非常艱苦。戴先生生而聰慧，志趣不凡；年幼之時，雖然不懂世事，但對他家常受人欺凌，以及母親含辛茹苦的淒楚情景，印象很深，心靈中產生強烈的正義感，所以一生好打抱不平。藍太夫人惟恐他逞強好勇，將來容易成為狂暴之徒，所以對他教誨很嚴，常以「識得好歹，辯明是非」相責勉。這對他畢生的事業，有很大的影響。民國卅四年，戴先生對「中美合作所」第十訓練班的學生講話時，曾經發表他的感慨說：

「我今天之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地，不負父母，不疚良心，完全是由於受了鞭策的原故。自我幼時，以至十四歲離開家

庭，整整受了十年嚴格的母教；數百次苦痛的答楚，才是練成今天的我。

可是，藍太夫人的母教是很賢明的，對於愛子除了不嚴加體罰，以警戒其性行可能放佚外；還常常以鼓勵代責難，尤其對愛子的求學，非常關心，雖然家境並不寬裕，但總是排除困難，讓他讀書。（在當時的社會，不是每個人都能讀書的）因此，戴先生在學塾裏是個學業優良的學生，在家中則是個善體親意的孝順兒子。

戴先生七歲啟蒙，在塾師毛逢乙先生處，讀了五年，天縱聰明，無論四書五經，一教便懂；一讀即熟，非一般常見所及。初學作文，有題問立志；他結論為：「希聖、希賢、希豪傑」。毛

逢乙塾師非常激賞，知道他將來絕非池中物。

十一歲，轉入仙霞國民小學肄業；十五歲，進入江山縣文溪高小，與姜紹謨、毛人鳳、周念行等同學。由於他的秉賦特高，從不死啃書本；而考試時，總是名冠全班。同學有難題，他詳加講解；同學有困難，他必多予協助。仗義慷慨，威儀懾人；活動力強，有領導羣衆的才能和氣魄。與同學交遊，從不考慮自己財力如何，而以東道主自居；同學有所活動，總以他的馬首是瞻。民國二年，他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一中學。

民國四年，戴先生十九歲，與鳳林毛秀叢女士結婚。他志在四方，不願株守家園，弄份小差使餬口。因此，他雖然考取了衢屬五縣的聯合師



戴雨農（笠）與母親藍太夫人合影。

範，但沒有去入學；雖然一度担任保安鄉的學務委員，但也祇是臨時承乏。自民國五年以後，他大部份時間，都是浪迹在外，經常往來滬、杭、金華、衢州等處。由於他的接觸面廣泛

，所以他對中國社會的真正內幕和問題的癥結，有充份的瞭解，同時對於為人處世和接近羣衆，也獲得很多教訓，增進豐富的知識。這些，都是書本上學不到的；對他後來的輝煌事業，却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點，非常難得，同時也是他成功的基點，那就是他能够入污泥而不染，始終保持超然物外的立場。他接觸過黑社會，和紙迷金醉的生活領域，但他祇是想瞭解分析牠，而不是沉醉到裏面去做「實行家」。雖然他有些知名的幫會朋友，那祇是一種俠義精神的接納，而不是羨慕幫會的勢力。所以，他並未參加幫會，也不抽鴉片烟、不賭博，也不跳舞。

民國十五年春末夏初，戴先生有事進江山縣城，在悅來客棧，遇到由廣東回鄉的毛人鳳；把晤暢談。當毛人鳳明白他的志向以後，竭力勸他到黃埔去。因為「革命的朝氣在黃埔」，祇有黃埔，才是鍛鍊創造時勢的英雄的大洪爐！

### 黃埔陶鑄筆路藍縷

民國十五年九月，戴先生考取了黃埔軍校六期，被編入入伍生第一團；同團的同學，有徐亮、王孔安、喬家才、勞建白等人。

由於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黃埔軍校從第一期開始，就有共黨份子在校中搞小組織，搞分化活動，而以「青年軍人聯合會」來爭取同學。校中的忠於國民黨的人士，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與之抗衡。因為壘壘分明，常起衝突，所以蔣校長特下令解散這兩個組織，另成

立「黃埔同學會」。當第六期學生入伍時，「孫文主義學會」已不存在；國民黨籍的同學，是個別的應付共產黨的暗算。而「青年軍人聯合會」雖說名義上取消，但共產黨徒，仍然暗中有組織有計劃的，對忠於國民黨而表現突出的同學，橫施打擊。加以國民黨的黃埔特別黨部以下各級黨部，在共產黨運用黨團的作用之下，也大都被其

操縱，以致情勢相當嚴重。等到北伐軍攻下武漢，共產黨居然變本加厲的利用其軍中的黨政工作，攻擊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蔣校長知道廣州的情勢，特派黃埔二期的同學胡靖安、陳超回到廣州，和忠貞的同學們聯絡。

因為陳超住在東山，有些同學去和他接頭。共產黨知道底細，先下手為強的製造一頂「東山

會議派」的帽子，指責陳超是「革命的反動派」，在東山組織「反革命集團」，誰去參加，就是「反革命」。

胡靖安則先從宣傳上着手，辦一份「三民週刊」，一面宣揚三民主義，一面揭發共黨陰謀。共產黨徒對他當然也很痛恨，但一時還無法予以打擊。

當時有些軍校同學，無緣無故的受到共黨份子的打擊和排擠，以致差不多的人，忍氣吞聲，不願隨便講話。

戴先生雖說好打抱不平，但是多年來在外浪跡的經歷體會，使他特別明白人情事故的竅奧，也具有應付逆境的智慧與耐力。於是，他老成持重，不露鋒芒，但却與胡靖安有聯絡，並且暗中調查共黨份子的活動事實，作成詳細紀錄。

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等在上海集會

，提出中國共產黨受國際共黨指使，破壞國民革命的種種劣跡。咨請國民黨中央採取非常措施，取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的黨籍；並將各地共黨危險份子，交由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十四日，廣州也開始行動；戴先生看到時機成熟，才將他平常詳密的紀錄，報告長官，逮捕了廿幾個共產黨徒。

清黨以後，黃埔軍校奉命成立騎兵營，戴先生因為行動敏捷，被選入騎兵營。此時，軍校的政治部主要官長，改由國民黨的忠貞人士担任，邵文儀任政治部主任，胡靖安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各級黨部也重新改組，戴先生當選為騎兵營黨部的執行委員。

由於胡靖安在廣州和戴先生有密切的接觸，對他的為人和才幹，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所以當胡担任蔣總司令的侍從副官，負責蒐集情報之後，特別羅致他為情報員。他幹得相當出色，而且興趣也很高；有時為了蒐集一件情報，甚至廢寢忘餐。

戴先生當初的情報工作，並沒有正式的官階名義，也沒有優厚的固定經費；尤其在蔣總司令第一次下野，東渡日本之時，甚至連食宿都成問題，真可謂不遑寧處。於是他寄居在表親張冠夫家的樓下。張冠夫在商務印書館當會計，所入有限，除了供他食宿以外，對他金錢花費，也愛莫能助。可是，他並不因為經濟拮据而鬆懈了他的情報活動，更不因蔣總司令下野而動搖他的信念，反而格外積極奮發的努力，有相當優異的成果。



民國三十四年聖誕節戴雨農(中)在重慶招待美方人員留影。

筆路藍縷，戴先生的事業，就是憑這樣艱苦堅毅的精神，開創出來的。

### 發皇開創無我利羣

民國十七年一月四日，蔣總司令應舉國的仰望，返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率各軍，繼續北伐。當時北洋軍閥，尙圖負隅頑抗，如何迅



戴雨農將軍出現在公共場合時的鏡頭之一。

子救平，以減少人民因戰禍而受到的損害，有賴於確切而靈活的軍政情報；於是在總司令部設立聯絡組，命令戴雨農以總司令部上尉聯絡參謀名義，負責主持。

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進展神速，北洋軍閥集中六十萬之衆，作困獸之鬥，戰況相當激烈。戴先生經常奔走於津浦和隴海鐵路兩側的豐、沛、蕭、碭等縣之間，蒐集很多重要情報，提供蔣總司令作指揮作戰的參考，常能收制敵機先的功效。

北伐完成後，蔣總司令召集全國軍政首要等協議編遣龐大而紛雜的軍隊，建立國防軍，以便埋頭建設，實行三民主義。不料當時少數統兵將領，扭於擁兵割據的積習，陽奉陰違；加以政客奔走播弄，因而常有叛亂情事。尤以汪精衛，在北平成立的擴大會議，聲勢最大，中央不得不下令討伐，遂在中原一帶，經過幾次大戰。蔣總司令親臨前線指揮，宵旰憂勞，甚至以柳河車站的列車爲行轅。戴先生化裝各種不同身份人物，冒險犯難，進入火線，蒐集情報，表現卓越。蔣總司令根據他的情報，作英明的決斷，機動的調用中央軍的主力，對付強敵；加以中央軍的強堅善戰，終於戴平叛亂，再奠統一局面。

當民國十八年底，第一次中原

討馮戰爭之時，曾於寧漢分裂時期爲虎作倀的唐生智，由海外歸來，自動投效中央，誓効前驅。蔣總司令寬宏大量，不咎既往，准許他統帥舊部，參加作戰，對他備加信任，付予指揮前線部隊的全權。討馮戰爭勝利結束後，中央因廣東受到廣西企圖進軍奪據的威脅，需要派軍前往援助，以致華中一帶防務空虛。十二月二日，原係馮玉祥舊部現已投効中央的石友三，突然在安徽蚌埠一帶叛變，自稱「護黨救國第五路總司令」。五日，唐生智也在河南稱叛，自稱「護黨救國第四路總司令」，通電全國，指責中央。當時，廣東、安徽、河南三處同時告急，勢態嚴重；尤以唐生智的突變，接壤西北，較難應付。

戴先生正在潼關一帶活動，聞訊，急忙趕回豫中偵查；當他抵達平漢線某一要地，發覺他已被唐生智下令通緝，並且懸賞十萬銀元，買他的頭顱。他情急智生，親入虎穴，說服担任當地軍警稽查處處長的周營長，棄暗投明，戴先生因勢利導，更進一步的替周策畫，叫周就近歸順中央。周營長被他的忠勇磊落所感動，當即向他表示：「同爲黃埔學生，絕不賣友求榮」；並且接受他的忠言，棄暗投明。策動被唐生智脅迫的部隊，相機反正。周答應照他的計劃行事，並設法掩護他脫險。

十二月十四日，唐生智叛軍，受不住中央軍大舉討伐的壓力，退到許昌集中，內部不穩。周營長看到時機成熟，於是依照戴先生事先跟他約好的辦法，策動唐部某一部隊相機反正，自己也脫離唐部，前往漯河與中央勁旅徐庭瑤部取得聯

繫。徐庭瑤接納了該一部隊的祕密歸順。等到十九年一月，唐生智反攻駐馬店時，中央軍遂在襄應外合的有利情況下，一舉反擊成功。周營長也參加戴先生的密勿工作。

聯絡組設在南京鷄鵝巷五十三號的組部，本是第一師胡宗南的駐京辦事處。胡將軍與戴先生，都是竭誠勸忠蔣總司令的，志同道合，深相結納，成爲生死知己。他知道戴先生的爲人，工作第一，絕不願以金錢小事，向人求助，更不肯向蔣總司令冒昧賸請，所以才慨然將房屋讓供使用。胡自己偶爾回京有事，仍然在此下榻，雖然相當擁擠，他也安之若素。

聯絡組的工作同志，人數不多，除戴先生本人，還有唐縱、張炎元、王兆槐、東方白、徐亮、趙世瑞、張冠夫、胡天秋等人，大都是黃埔同學。工作吃重，都是單人匹馬，儘可能運用自己的所有關係，隨機應變，獨斷的解決問題，達成任務。身份祕密，沒有名義地位；待遇有限，談不上優厚特殊。而他們所以甘之如飴，爲人所不願爲、不屑爲，完全出自一腔愛國的熱忱和對革命領袖的擁戴，並且還充沛着一種師生的情感道義。戴先生特別注意和提倡，就是這些。他曾說：

「革命黃埔學生之責任，在於擁護唯一的領袖，完成此神聖的革命使命。故黃埔同學，應有穩定的立場，堅決的信仰，不辭勞怨，不怕艱危，不爲個人打算。」

由於他操持克己利羣的立場，無個人名位利祿的慾求，由於他在工作上最具績效而又不自矜伐，所以當國難日亟之時，許多更重要的密勿工

作，自然需要由他去承擔，去領導，去開創。

### 肩負重任救平巨變

民國廿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廿一年「一二八」，日軍又侵犯我上海；而國內則共匪擾亂，禍延七省，民生凋敝，國勢危殆。蔣總司令於是年三月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挽救危亡。當即召開高級軍事會議，決議組織抵禦外侮安定國家的參考。於是自四月一日起成立一個處級的情報機構。（是年九月命名爲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戴雨農奉派爲處長。

此一情報組織，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尙屬首創；不但無成規可循，而且責任艱鉅。除了必需偵查日本侵略我國的一切陰謀活動以外，還要揭發漢奸分枝組織的賣國求榮；用以達成捍禦外侮的目標。不但必需鎮壓背叛中央的顛覆行動，還要防止共匪的滲透分化；用以鞏固革命政權，貫徹「安內攘外」的國策。戴先生自揣學資淺薄，不敢當此大任，乃晉見蔣委員長懇辭。

蔣委員長派戴雨農爲處長，原是以加重其職權，使其能放手辦事；見他以資淺力辭，乃勉勵他：「祇要你有決心，其餘不必顧慮」。戴感奮之下，不能再辭；乃鄭重而慷慨的回答：「從今天起，學生決以生命爲革命而犧牲奮鬥，失敗則請委員長加罪，成功或竟爲敵所殺，決無後顧。」

正式的情報機構成立了，人員增多，責任加重；可是在經費方面，還是相當節約，不能與外

國的情報機構相提並論。這一方面是國家太窮，同時，戴先生也有他的見解：

「我對於同志，不使其有餘，也不使其不足。假如同志工作經費過多，容易使他墮落腐化；如果不足，顧慮他會貪污不法。我對每一位同志的家庭，都當做我自己的家庭。他們的實際需要，我都知道，我的原則，是使同志在可能範圍內自力更生，庶幾可以應變；而我負責解決同志的急難痛苦，使其安心工作，無後顧之憂」。

戴先生言出必行，對同志的照顧，決不是一種施捨，而是以精誠道義相感應。

因此，戴先生領導下的工作同志，大部生活儉樸正常，如同恂恂君子、標準軍人，絕少狂嫵濫賭的成爲亡命之徒。

戴先生很注意延攬人才，他找人用人，完全以工作需要爲主，而不局限於學資經歷；對同鄉親友，不偏愛也不避諱。惟一考究的，是慎其始。每用一個人，必先有一段考驗觀察的時期；往往先以較低待遇位置，較瑣碎的工作，對待一個準備重用的同志；而靜觀他的志量 and 耐力，同時也有種磨練的作用。後來擔任國防部保密局局長的毛人鳳，和他的令弟毛萬里，就是在這種意願之下，被他羅致的。

除了羅致人才，他還重視幹部的訓練。自民國廿一年以後，即成立專門訓練情報人員的訓練班，首重革命精神的陶冶，其次爲工作技術的熟練。後來抗戰極盛時期，他的訓練單位遍佈全國，幾乎每樣專業性的工作，都經過特別的訓練，受

其訓練的人員達兩萬六千餘人，部隊達四萬九千餘人。凡是經過他訓練的人，都有一種風雨同舟的精神感應，差不多都以做他的學生為光榮。而他也從不派一個外行人去做內行之事，也從不讓一個同志去作無謂的犧牲。

由於戴先生的熱情洋溢，以忠義報國為倡；廣羅兼收，以手足之誼互勉；所以人才輩出，樂為所用。加以他能曲諒人之所短，不以瑕疵而有成見；能善用人之所長，達到人盡其才的地步。所以能以較少的人力與經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自廿一年四月至抗戰開始，蔣委員長在「安內攘外」的國策之下，積極的從昭蘇國魂，改善民生，加強建設，充實國防各方面分頭努力，以期由救亡圖存而禦侮却敵，由克敵制勝而建設現代化國家。然而，內憂外患，紛至沓來，阻礙重重，問題很多。

國內方面，全國同胞，由於日軍「九一八」「一二八」以還，一再侵凌，莫不義憤填膺，抗日反日的熱潮，空前高漲，政府因內患未平，準備不充，無法率爾與日軍作攤牌性的決戰，祇有委曲求全，爭取時間。可是一般反對政府的軍人政客，却利用此全國抗日的熱潮，作責難政府的藉口；於是，攻擊政府「不抗日」，為當時反政府者最得意的武器。

過去曾經是參謀總長的李濟琛，廣東省主席陳銘樞（二人原為十九路軍的老長官）失意之餘，以為有機可乘；乃于民國廿二年前往福建，煽惑曾在上海抗日有功的十九路軍反叛中央，自創

局面。企圖利用國人對十九路軍的好感和抗日的熱潮，顛覆政府，奪取政權，可是，又顧慮孤軍無援，竟然異想天開的與正在被圍困在江西的共匪聯合，並且請求蘇俄支援。

當時，戴先生已經在福建佈置有情報組織，在上海也已建立有無線電訊偵收的單位。十月，即已偵知李濟琛密派代表，攜帶他和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四人的聯署文件，與正在盤據江西的共匪，商談合作問題，並且簽訂一項「抗日作戰協定」；一面急電蘇俄速運大批械彈來廈門，轉運補充江西的「紅軍」。

蘇俄（當時與我斷絕邦交），早欲援助共匪，但因共匪被困腹地，未能掌握到優良港口，以致無法實現。現在既有優良港口廈門可用，當然欣然應允，於是復電支援，先將步槍三萬枝、輕重機槍四十挺，各式火炮二百門，與各種彈藥器材等，集中海參威裝船待運；另由上海先運中國現鈔二百萬元，作為「紅軍」的軍費。各項密電，也被戴先生的電台偵收破譯。

十一月，李濟琛、陳銘樞等果然發出通電，主張「聯合抗日」，為共匪張目；並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組織「生產黨」，自稱「中華共和國」國號，公然叛國。事已顯露，且與蘇俄有勾結，如不設法迅予瓦解，則狼狽為奸，後患無窮。

於是，戴先生除命令部屬積極繼續蒐集情報，呈報蔣委員長參考外；並且親赴廈門轉漳州，深入虎穴，說服叛軍師長毛維壽，沈光漢，促其棄暗投明，憬然反正。毛、沈應允相機行事。

蔣委員長接到戴雨農的情報，即已作隨時進擊的準備，但為避免再起戰爭，總希望彼等能懸崖勒馬，幡然悔悟。所以，當閩變初起之時，他曾警告十九路軍，限一星期之內解散「人民政府」，重行歸隊，否則決定用武力收平。全國各界，也紛紛致電福州，勸十九路軍珍惜過去榮譽，幸勿被政客所利用。

可是，彼等一意孤行，竟將十九路軍改稱為「人民革命軍」。

蔣委員長見叛軍無意歸隊，乃迅即下令討伐。分兵三路，攻入福建，並肅清閩西山區的「紅軍」，隔斷叛軍與共匪的聯絡。由於敵情的充份瞭解，隨時掌握，知己知彼；所以各路進展神速，叛軍望風披靡。蔣委員長乃于廿三年一月親赴延平，統率各軍，沿閩江急進，福州震動。

另一路由海軍陸戰隊為前導，步兵兩師為後繼的奇兵，適時從海上進攻福州與廈門。此時，事先經戴先生策動，取得默契的毛維壽、沈光漢兩師，不但不遵命令進軍抵抗；反而在泉、廈一帶宣佈效忠中央。於是中央軍順利登陸，叛軍投降，陳銘樞等逃走，巨變收平。

另有「生產黨」的黨羽黃天煜、鄭藏等多人；當閩變發生之初，在武漢組織「人民政府武漢分會行動委員會」、「第三黨民主革命同盟」、「生產黨武漢支部」；以「武漢農業學會」為掩護，經常秘密集會，密謀響應，也被戴先生的情報組織漢口站所破獲。

福建偽「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成立不到一月，即被消滅；共匪援閩的第一、三兩軍團祇

好折返，蘇俄集中在海參威待運的武器裝備，也無法運交。制敵機先，戴先生情報活動的貢獻，關係極大。

民國廿五年六月，李濟琛又煽惑兩廣軍政當局，以「抗日救國」為名，抗命中央，甚至出兵湖南。也由戴先生的情報組織，用策動陳部反正的手段，化解了一場巨變。（詳情請參閱發表于本刊的拙著戴雨農與鄭介民）

### 剪除巨兇維護安全

失意軍人政客，除了煽惑地方軍政要員，製造叛亂外；還不擇手段，買通職業凶手，專門暗殺中央要員；企圖掀起政潮。僅僅民國廿三年，戴先生破獲行刺蔣委員長的要求就有三次之多；至民國廿四年，愈演愈烈。

民國廿四年十月廿五日，湖北省主席楊永泰在漢口江漢關碼頭被刺身死；凶手譚戎軒（又名陳燮超）當場捕獲。但他却對治安機關聲稱係「奉命殺漢奸」；不但不以為犯罪，還自鳴得意的自認為愛國英雄。事關重大，祇好請戴先生來處理。戴先生派一位司法科長由南京到漢口，在漢口的廖樹東和朱若愚的協助之下，接辦此案，很快的追查出現正的幕後主使人是匿居在上海的劉蘆隱。

劉蘆隱一度曾任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失意後，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軍團」，自為首領；另組「中華青年抗日除奸特務隊」，派遣黨羽在各通都大邑秘密活動，行動詭秘，戴先生早有偵查紀錄。楊案既破，乃立即將劉密捕到案，連同搜

查到的證據，一併解送有關機關法辦。並且根據此一線索，將劉的暗殺集團的其他要犯張家義、楊西平、楊其新等先後逮捕歸案。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是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六中全會在南京中央黨部開會，全體委員正在門前排列照相時，行政院長汪精衛，忽被冒充攝影記者的刺客孫鳳鳴開槍殺傷。由於孫鳳鳴被汪的衛士當場打死，失去活口，反而影響到全案的偵查。

行政院長被刺，如不迅速破案，可能再起政潮。戴先生乃親自偵查，迅即從孫鳳鳴所假借的「晨光通訊社」得到線索，在上海捕獲同犯張玉華等人，訊明係職業凶手巨頭王亞樵所主使，同黨尚有余立奎等人，已逃匿香港。王等係李濟琛、陳銘樞所僱用。

戴先生明瞭案情以後，一面急電香港同志，與港府華探聯絡，將余立奎等捕獲扣押；一面商請外交部向港府交涉，將余犯等人引渡回國究辦。可是，余立奎等狡詐，堅決否認參與刺汪案件；李濟琛、陳銘樞，再在暗中加以救助，以致引渡事不能解決。戴先生以此案關係我國法權與國際地位甚大，不能畏難却顧，不了了之，以免歹徒得以僥倖苟免，甚至以外地為逃避處，而肆無忌憚，益為猖狂。於是，派員赴港，一面延聘英籍律師，作法理上的探討；一面提出有力的人證物證，向香港法庭提出控訴；歷時八月，始告解決。將余立奎等犯引渡回國，送江蘇高等法院歸案法辦。惟王亞樵仍逃逸無踪。

戴先生做事講究澈根澈底，嘗勉勵同志：「

要有孺子可教的態度，澈根澈底的辦法」。王亞樵是職業凶手的首領，不予剪除，終有後患。乃根據在香港辦理引渡的詳細報告，發現王亞樵與余立奎的妻子木蘭，有不正常關係。於是，再對木蘭，曉以大義，動以利害，說服她為國立功。於是，木蘭在戴先生有計劃佈置之下，與匿居廣西梧州的王亞樵取得聯繫。

可是，廣西環境特殊，不可能以密捕到案的方式處理；但如有洩漏，則元以漏網，仍留後患。戴先生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特派鄭介民赴港處理此事。密派行動幹員王魯翹五人，隨木蘭赴梧州，執行國法，將王亞樵擊斃。

另有曾在上海行刺宋子文部長未遂的凶犯石敬亭、孫其俊、周茂文、李寶元等人，行刺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已遂的凶犯項應昌；也因戴先生根據迭次破案的線索，緊追到底，而在上海、崇明、西安等地被捕送法辦。

由於職業凶手的澈底剷除，政府的官員，才免去時遭不測的危險，生命安全才有保障，社會的治安秩序，才能因以更趨安定。（未完）

##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穿線平裝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